

中國教會在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擴展

沙百里著 陳愛潔譯

(編者按：本文承沙百里神父原刊於法文雜誌《Eglises D. Asie》二零零八年第三期，承作者允許出版，特此向作者及該刊致謝。本文原文為法文，由本刊同工溫順天神父譯為英文，再由陳愛潔女士譯為中文。)

傳媒發放有關中國教會的資訊時，大致上都給人留下一種對中國的宗教狀況頗為負面的印象。在中國，當局對宗教活動的控制無疑是十分嚴厲。不過，很明顯的，儘管面對很多限制，基督徒活動在

過去三十年已有相當大的發展。

鄧小平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開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開創的開放及現代化政策，引發這方面的發展。在中國，五大宗教，即佛教、伊斯蘭教、道教、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信徒，被邀積極參與國家的現代化。這些宗教都顯然有別於盲目迷信和顛覆的宗派，因為它們是以經典為基礎，並教導道德紀律。此外，基督徒作出的貢獻都能夠得到廣泛欣賞，這是因為他們的專業技能和當中有很多人的獻身精神，也是因為他們與歐美發達國家之間的緊密聯

繫。自一九八五年以來，這些國際聯繫已不再受到批評。恰恰相反，它們都被利用來鼓勵投資，並引導外國資金流入國內。相比之下，當局小心謹慎地使中國基督宗教的獨立性不受任何外國干預。憲法第三十六條告誡宗教不受外國勢力支配，是特別針對天主教徒和他們對教宗權威的忠誠。不過，當局承認信徒與教宗之間的精神聯繫。由於教宗首席權是信仰的條文，所以沒有被否認。然而，當局否認聖座擁有干預中國教會事務的一切權力。基於政治主權的原因，中國政府至今一直拒絕了所有與梵蒂岡建立關係的嘗試。

面對政府壓力，採取多種態度

官方拒絕教宗的權威，正好解釋「地下」天主教團體的長期存在，因為這些團體拒絕順從天主教愛國會的要求。地下天主教徒或多或少都嚴厲譴責那些與政府合作並服從愛國會指示的教友。

官方與地下天主教徒之間的衝突持續發生，其

激烈的程度按地區而有所不同。如果這些衝突導致互相排斥，顯然令人十分遺憾。這變成反見證，否定基督所宣告的福音有關互愛的命令。另一方面，不斷冒出的有關基督訊息的不同取向，既要求人們入世又要求他們出世，也顯然令到人們迷惘。地下教友堅持信仰的首位和忠於教會的重要性。官方教會的教友則嘗試融入他們的社會和文化。他們都可能在眾多的非信徒中間散發基督教的價值觀。

新一代信徒付出極大的努力

中國的基督新教的成員也有他們的問題。但是，他們也許較少依賴牧師，對教會法律的爭論亦較少。他們把他們的訊息集中在接納耶穌基督是救主，而不是集中在教會的法律上。他們的聖歌比較簡單，亦能聯繫到信眾的日常生活。他們的傳統教會也背負著三自愛國運動的擔子。不過，得到美國和台灣支持的佈道者，展現出一種非凡的精神，甚至比地下天主教徒更加強烈。他們多次在舉行聚會

時遭到警察突擊搜捕，因為這些聚會沒有向政府登記。他們的領袖常常被迫繳交罰款，或被監禁。一九五零年，基督教徒的人數遠低於天主教徒。今天，他們的人數遠超過天主教徒，而且更爲廣大民眾認識。

至於年輕的神父，都成功地和顯著地實踐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禮儀改革。然而，只是到了一九八二年，他們才開始在上海修院發現梵二的文獻。香港教區的羅國輝神父應邀在中國的各大修院傳達新的禮儀。

由於禮儀是教會的內部事務，一般都不會受到政府干預。只要司鐸在講道時不觸及政治議題，已是足夠的了。除禮儀外，天主教會亦可以組織聖詠團、輔祭會，或研經小組。這些由青年組成的團體喜歡探訪其他教區，尤其是著名的聖母朝聖地。

這些團體所展現的生氣，吸引了無數皈依者，慕道班尤其盛行於大城市，由北京開始，當地很多大學生都接受基督信仰的講授。基督宗教大致上都

受到好評，而且比其他宗教更爲吸引。爲什麼？首先，基督宗教不再被視爲外國宗教。共產政權在導致中國的宗教完全由中國人員組成這方面提供很大的幫忙。其次，基督宗教被視爲與現代性有關連，它向個人的良心提出呼籲，也尊重人的位格。有些知識份子亦認爲，基督宗教緩解現代化所造成的道德偏差。

年輕神父同樣把一定的精力，甚至是過度的精力，花在興建有氣派的聖堂和露德聖母山洞，以中國傳統的亭台樓閣作裝飾。儘管中國鄉村的天主教人口是貧窮的，但神父仍渴望興建附有高塔和塔尖的聖堂，好能給天主教會面子。他們想興建的聖堂，至少好像基督教堂或佛寺那麼美麗。他們的理由是，聖堂越氣勢雄偉，就越吸引更多慕道者。主教和神父都認爲，興建聖堂或翻新舊聖堂，都是優先考慮的開支。因爲他們表示，如果有一座聖堂，天主教生活便會恢復和組織起來。的確，宗教的禮節聚會在他們的文化傳統中擔當重要的角色。

年輕修女的人數遠超過年輕神父。在全國約有四十間初學院。修女一般來自貧窮的農民家庭，她們是一種教育的受惠者，而這種教育並沒有包括中學畢業。她們屬於本地修會，是由中國主教在近年成立的，或者，甚至屬於國際修會過去創立的中國團體，例如：方濟各瑪利亞傳教女修會、拯望美修女、獻堂會修女、聖心修女會，以及聖神修女會。

她們在法理上並不隸屬於任何由外籍總會所領導的國際修會。她們的長上是教區主教，以及她們被派往服務的堂區的主任司鐸。她們的院長的權威經常被貶抑，而委派給修女的工作往往是卑微的。爲了符合社會服務的要求，一定人數的修女受訓成爲醫生和護士。

修女與仍然主要得到外國資助的神父有所分別，她們具有較獨立的精神，較少受到外國人影響。由於她們管理幼稚園和診所，所以逐漸更能夠自謀生計。她們展現一種仿倣西方的獨立性。例如，她們穿著更適合日常工作和本地習俗的服裝，而不是

一般的長袍。她們在教會聖統制內沒有任何權力，所以相對於神父，較少受到政府注意。她們有更多自由參與不同的活動，讓她們離開聖堂的封閉氣氛，也樂於接觸非基督徒。修女透過與兒童、病人和老人接觸，接近當地的家庭，她們經常探訪家庭，也接近人們。

難於擺脫重重的政治束縛

宗教的進取動力，是中國共產黨傳統處事方式中最感到擔憂的因素。國家越是隨著經濟改革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而開放，就越傾向收緊內政，爲了維持社會的穩定與團結。

眾多天主教徒不聽從官方主教團，因爲主教團與政府來往而聲譽受到損害。而且，正是主教團代表官方任命主教。但是年輕的神父，雖然由教區內的同事選出，也得到地方政府的認可，卻設法獲得聖座的認可。二零零三年，有三位主教甚至更邁前一步。他們不但獲得聖座的任命，也願意公開宣佈

有關任命。他們因而貶低官方主教團提名的權力。此舉後來引起政府的強烈反應。

二零零五年，上海教區金魯賢主教祝聖邢文之神父為輔理主教，同時得到羅馬認可，和中國主教團的正式任命。可惜，接著這次喜事之後，翌年卻發生在沒有獲得羅馬的認可下，祝聖三位主教的事件。這些祝聖典禮分別在雲南、安徽和江蘇舉行。教宗在二零零七年發表的信函中清楚指出，主教的任命必須得到羅馬的認可。

與普世教會團結一致

中國在過去三十年的開放容許進行多次相會和宗教交流，這當然有助於維持教會的士氣，儘管教會由於被孤立而發覺自己處於虛假的境況。多虧上海主教的主動，以及一些熟悉中國的傳教會的支持，有好幾百位神父、修生和修會會士在歐美及菲律賓進修神學課程。基於種種原因，這些旅居外地的日子亦非毫無困難。其中的理由包括：由於自從

修院在一九八三年重新開放以來，質素較差的培育導致缺乏宗教學科知識；傳統天主教團體的熱誠與西方教會十分世俗化的生活之間的時滯；中國的直覺思維方式與西方抽象及批判的思維方式之間的理智衝突。另一方面，他們進修的成功之處，就是在外地的神學生可以在一個世俗化的社會環境體驗一個更深思熟慮的信仰。他們因而能夠學習更深入了解基督信仰給予人類生命的支持，並準備自己在現今正不斷發展的物質主義中國社會作見證。

能夠以中文授課的神學、禮儀、聖經等科目的教授，應邀從台灣、香港，以及其他地方來到中國的修院講學。他們能夠滿足對教學人員的需求，並且傳播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所倡議的改革。其中一人是原籍上海的慈幼會陳日君神父，曾在上海佘山修院講授哲學和神學。陳神父後來成為香港教區主教和樞機。

年輕神父在旅居歐美一段時間後回國，雖然他們有新的文憑在手，但在重新體驗傳統團體的節

奏，以及面對政治壓力，有時經歷很大的困難。但是，他們當中大部份人提供很出色的服務，經常擔任教授，甚至總修院院長。有些人把很多精力投在大有希望的新發展項目上。在北京，趙建敏神父在魯汶大學考獲博士學位後，在四十間提供外語碩士學位的大學開辦一項基督徒文化課程。他所聘請的十位教授，其中大部份都是年輕神父，取得美國的學位。在河北省省會石家莊市，曾在菲律賓受教育的張士江神父主辦《信德報》，把這份刊物上載互聯網。他也創辦社會服務的分支機構，類似歐洲的明愛機構。在國家的層面，由二零零三年開始，每年三月至十二月在座落於北京市南郊大興區的全國總修院，為晉鐸十年或以上的神父舉辦培育課程。

交流的增加

外國信友與中國信徒之間的交流，以很多不同的方式倍增。其中的例子有：某些傳教機構的「中國服務」處，香港聖神研究中心，以及自一九八六

年在新加坡出版、中英對照的《中國天主教會指南》。二零零八年六月出版的第七版指南，加入了電郵地址和網站。此外，互聯網作為交流的網絡，以令人眩暈的速度發展。現時，仍在使用的中國天主教網站，可見於石家莊，或香港道風山基督敎叢林，或天主教亞洲通訊社，即「天亞社」。

全球化的過程雖然由經濟促進，但同時應該包含人性、道德、社會及文化等層面。教宗本篤十六世在他的致中國天主教徒信函中，明確提到這一點。按照這個觀點，華人世界與西方之間日益豐富的對話，將更加重視如何打造為全世界接受的基本倫理。中梵之間停滯不前的官方關係，絲毫沒有阻礙中國基督徒與外面世界的基督徒之間多種多樣的友好交流。

□